

中外名學者論

# 21

## 世紀初的中國

熊景明  
關信基 編

變革中的中國社會：陳劍光・陳健民・丘海雄・王紹光・何建宇・法制：Børge Bakken・Jerome Cohen・Pitman Potter・政治：Richard Baum・Jean Oi・宋永毅・農村：Thomas Bernstein・李連江・Kevin O'Brien・Jonathan Unger・家庭・社會：Deborah Davis・李實・岳希明・Martin King Whyte・教育：邊燕杰・Ronald Breiger・Joseph Galaskiewicz・Gerard Postiglione・講今・經濟：Carsten Holz・Christine Wong・地方與中央：Nicolas Becquelin・Jae Ho Chung・Pierre Landry・勞動：Anita Chan・李強・Dorothy Solinger・農村經濟：Scott Rozelle・黃季焜・Keijiro Otsuka・汪三貴・李瑩星・中國與世界：David Shambaugh・David Zweig・鍾少鳳・陳智宏・兩岸關係：冷則剛・Gunter Schubert・吳玉山・概論：Ezra Vogel・Lucian Pye・金耀基

D6  
201213

港台書

# 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

熊景明、關信基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

熊景明、關信基 編

© 香港中文大學 2009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256-2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Studies on the Beginning of 21st Century China b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in Chinese)

Edited by Jean Hung and Hsin-chi Kuan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256-2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 序一：為學術服務，為社會服務

• 金耀基 •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四十周年研討會」開幕詞

朋友們：

USC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 團聚研討會是中心成立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活動，也應該說是中國研究領域的盛事，與會者的名單簡直就是中國研究專家人名錄。我很榮幸在此代表中文大學歡迎眾位貴賓。

香港中文大學創建於1963年，同一年大學服務中心在香港成立。兩間那時看來毫不相關的機構，卻由冥冥之中的主宰將他們拴在一起。中大建校的宗旨是「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我們在白魯恂 (Lucian Pye) 教授的回憶中看到，將USC設在香港其實相當偶然。偶然中有其必然，USC是由希望了解中國的西方學者催生。就像兩位同道者最後相遇，1988年秋，25年後，中心成為中文大學的一部份。中大與西方的學術交流，從此多了一條紐帶。中心的同事以「香港速度」完成圖書資料的搬遷、安放，迎來了在那個著名的春天去不了大陸、改道而來的一批西方學者。誰又知道這是否僅僅是巧合？半世紀以來，中國研究經歷了幾次大變故。在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是塊「外人不得入內」的私家重地，研究者要像偵探，拿望遠鏡去窺查真象。學者們在亞皆老街155號小樓中，苦讀鐵幕後飄出的一點點資料，揣摩《人民日報》字裏行間的意思；訪問大陸來的難民、移民。此情此景，今日道來，恍如隔世。80年代初白霖 (Lynn White) 教授作過一份統計，有200多本中國研究專著是中心的訪問學者所做。據說早年中心訪問學者的足球隊還打敗過中大校隊。USC足球隊員Teiwe教授今天也在場，那一批年青學子成了早生華髮的學術權威，今日共襄盛舉，令這次聚會彌足珍貴。

中心重要的一批內地來的合作者之一，文革中游水到香港的麥港先生在他的回憶文章中，揭示了鮮為探究過的現象，即被訪者的社會關懷和使命感對研究的影響。70至80年代研究學者冷靜的分析中，透露出那

個嚴峻時代，經歷劫難的中國人的吶喊。這一批受訪者與訪問者的結合，為中國研究留下傳世的篇章。儘管當時研究條件不能與今日相比，許多在老式打字機上敲出來的作品，並不比日後用科學化手段完成的研究遜色，值得這一代學者驕傲。

USC秉承、發展了這個特殊時期形成的特色，並且將提倡研究為社會服務作為中心的宗旨之一。1996年以來中心通過大陸學者訪問計劃，在內地物色從事實證研究，並富有知識份子責任感的學者，邀請他們前來做研究和寫作。這些學者來訪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他們在這裏不僅開拓了視野，而且找到某種「身份認同」。內地學者戲稱USC為「黃埔軍校」。在坐有許多這些年來的「新同學」，標誌了中心服務對象的擴大，也意味著中國研究進入新的時期。

中心的圖書收藏由在坐的Thomas Bernstein教授1965年設定方向，後由具卓識遠見的中心主任John Dolfin先生在16年間奠定規模，40年來經過幾代同仁不懈的努力，依仗香港的地利，始而海外基金會，繼而香港中文大學的支持，建立起當今世界最為豐富、完善的當代中國研究資料收藏。中心收藏的第一手研究資料，例如年鑒、統計年鑒、地方雜誌等，均已超過了國家圖書館。四面八方來的訪問學者使USC別具吸引力。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追求的最佳學術研究環境，所指不僅是文獻資料，還有同行間的對話、爭論形成的熱烈學術氣氛。USC每週的午餐研討會是香港最活躍的中國研究論壇。七、八十年代許多在中心做研究的人都提到，訪問學者間的思想撞擊，使他們在中心的日子多姿多彩，終生難忘。不久前一位史丹福大學的研究生來信說，她原來只打算來利用這裏的圖書收藏，結果發現中心的優勢遠非僅止於資料，她在此結識了許多人，交了朋友，深受他們的啟發。「濃厚的學術氣氛是中心最寶貴的資產，我從未見到過這樣的地方。」我們深為慶幸中心的又一傳統得以保持。可以說40年來中心一貫的服務精神，是一種從為學者服務，到提倡學術為社會服務的精神，相信這種精神，是中、西學術機構所共通的價值。最後僅代表我本人和中文大學，歡迎你們及你們的學生今後常來。USC是全世界中國研究者之家，永遠向大家開放。

(熊景明 譯)

## 序二：中心成立往事追憶

• 白魯恂 (Lucian W. Pye) •

我算是過來人，可以談談成立大學服務中心的往事。

事情可追溯到1962年。卡耐基基金會主席Bill Jim Perkins和他的主要助手Bill Marvel對基金會在哈佛大學成立俄國研究中心取得的成功十分高興，想到建立一個類似的中國研究中心是個好主意。但是因為中國內戰、冷戰和朝鮮戰爭引起的情緒，當時的中國研究領域存在著深刻分裂，這讓他們感到頭痛。當時哈佛的費正清對北京政權較開明，西雅圖的George Taylor則忠實於國民黨。在這種分歧之下，不管他們決定把中國研究中心設在哪裏，都無異於一種政治聲明。於是Bill Marvel到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學院來見我，讓我替他們想想辦法。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腦子裏不期然冒出一個想法，我說：「何不把中心建在一個中立的地方，讓全世界的學者都可以利用它呢？香港聚集著很多中國觀察家，也許正是個理想之地。」Bill回到紐約後，興奮地向Jim Perkins談了在香港成立中心的設想。

他們立刻著手工作，組成了顧問委員會，請我擔任主席。Bill則去香港瞭解法律細節。他很快感到必須謹慎從事，英國人對在這塊殖民地上做研究的人十分敏感，擔心中國人會懷疑他們庇護諜報活動。他按英國的習慣選擇了中心的名稱以示尊重鄉俗。Bill覺得他不得不審慎行事，也因為第一任主任Bob Grey傾向於不理紐約自作主張，兩人之間最後鬧得很不愉快，分道揚鑣。

所幸那時，Jerry Cohen正在香港做中國法律研究，基金會說服了他擔任執行主任。繼這位出色的主任之後，還應特別提到Preston Schoyer和John Dolfin。1963-1964年恰好是我的大學休假年，我們一家人秋天留在Palo Alto的行為研究中心，1月份去了香港。屆時Jerry已經把中心成立起來了，在半島酒店後面馬可波羅苑 (Marco Polo Court) 的辦公室

裏忙，中心搬到亞皆老街之前一直在這裏辦公。大學服務中心從一開始就不僅吸引了美國學者，而且吸引了另一些國家的學者。第一批訪問學者有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的經濟學家Ken Walker，一批又一批學者先後來到。沒過多久，在幾乎所有論述中國的著作裏，都印上了對大學服務中心的價值表示感謝的文字。

大學服務中心的獨特之處不僅在於它為學者們提供的服務，而且在於它使學者、記者和外交官員聚在了一起。Jerry組織了午餐討論會，把美國總領館的人請來。其實，後來負責中國事務的一大批傑出外交官都曾到過中心，例如Nick Platt、Mark Pratt、Mort Abromowitz、Don Anderson、Herb Levin、Bill Gleysteen和John Holdridge。來訪者中還包括一些傑出駐港記者，如《紐約時報》的Seymour Topping和Ian Stewart、《時代週刊》的Stan Karnow和Eric Pace、《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Takashi Oka和《華爾街日報》的Bob Keatley。Jerry還不放過任何一位對中國很有研究、可能途經香港的過客，例如來自臺灣的Myron Cohen，都來中心做過訪問。

中心也同Anderson Shih領導下的友聯(Union Research Institute)交往，研究所豐富的中國報刊剪報資料以不多的收費提供給學者使用。Donald Klein對於建立交往功不可沒。大學服務中心也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書籍和中文報刊收藏，後來成為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文獻收藏之一。

我們成了真正的中國觀察家的社區，彼此分享著我們對當時封閉的中國所能瞭解的一切。我們很多人採訪大陸逃出來的人。這些人各自瞭解大陸中國的不同事物，我們便把他們介紹給研究不同題目的學者。當時香港有很愛出風頭的人，自稱「愛國華人」，他們在所有問題上都追隨北京的中共路線，攻擊中心是冷戰分子的巢穴，令我們頗煩。有的學者批評大陸時，警惕到這些人的存在，或多或少影響到他們的坦誠己見。

我們十分清楚受訪者，大都是從大陸逃出來的，可能對那裏的情況有過於負面的看法，因而產生偏差。有些學者傾向於對他們批評中國政府和時局的言論大打折扣。更不好是，很多逃離大陸的調查對象有時意識到，他們的言論要是過於負面的話，有可能降低信用，從而惹來麻煩，連為他們付出的時間支付的那一點點報酬也都沒有了。於是受訪者在一定程度上對自己的言論進行自我審查。有些老練的受訪者告誡那些剛逃出來的人說，假如他們想保住調查對象的身份，最好少說政府的壞話。這種調查人員和受調查者都對負面資訊打折扣的做法，確實導致一些學者對大陸的發展持過於正面的觀點。令人吃驚的是，很多人甚至看不到大躍進和後來的文革初期的情況是多麼糟糕。當時的研究者自信地以為，他掌握了有關中國現狀的第一手證據，一部分事實仍被掩蓋了，看不到毛澤東恐怖統治的事實。事實上，當時學者也不接納臺灣的消息，認為通過採訪逃亡者得到的更具批判性的觀點不可信，是國民黨

的宣傳。擔憂調查過程不夠客觀成為共識，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學者在討論中國事務時更為謹慎。

我們也通過跟記者和外交官的交談收集資訊，主要是相互學習，而不是為了尋找中國的秘聞。記者即使沒有掌握全部事實，也能按時發稿，學者們歎為觀止。我們慶幸自己可以更從容地做研究，我們也抱有希望，只要假以時日和更努力地工作，我們終究能夠把事情做好。我們佩服那些外交官，必須遵照上司的時間表做出決定，學者則非得掌握了必要的證據，並不急於下結論。

學者、記者和外交官之間這種融洽、相得益彰的關係，很快就因越南戰爭引起的對立情緒可悲地結束了。甚至在中心設立之初，駐港記者就開始飛到西貢採訪美國最初捲入戰爭的情況。意見的分歧雖然沒有讓不同專業人士間變得營壘分明，但當時激昂的辯論令行內分歧，使廣泛的合作變得不太可能。

可以說，大學服務中心成立於一個幸運的歷史時刻，那時所有關心中國發展的人都可以開展合作，努力瞭解竹幕背後正發生的事情。我也相信，中心的開放精神有助於包容學術爭論，消解分裂。

(馮克利 譯)





## 序三：中心走過的頭四十年

• 傅高義 (Ezra F. Vogel) •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四十周年研討會」主題演講

我們今天在此祝這一獨特的學術機構成立四十周年，同時也對開創中心的功臣，對使它日愈成長，並帶領它邁向未來的人，也對所有曾為中心一份子的人，表示敬意。

沒有這個中心的話，當代中國研究當何以進行？整個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如果不是來到香港，得到中心的支持，我們何以瞭解當時中國人每天的生活？我們在此學到東西，成為在大學課堂上講授當代中國最核心的內容。這些教授教出來的一代代學者、記者、政府官員、律師、商人，其後均成為中國向世界開放的橋樑。眾多到中國來的出色外國律師及大部份高層次的生意人，都曾直接或間接從中心獲益；好些位曾在中心待過的研究者都成了出色的政府官員，例如Steve Fitzgerald成了澳大利亞第一任中國大使，Dick Solomon在中美早期接觸時曾任基辛格的助手，而Mike Oksenberg則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起了關鍵作用，衛奕信爵士則後來成了香港總督。長期以來，中心每年經費其實不過二十萬美金。越戰，中蘇分裂，毛對西方開門，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毛澤東逝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天安門事件、收回香港主權，中國經濟起飛，知識復興，我們如初出道的記者一般，關注著每樁變故，熱烈地爭辯事件的影響，中國的走向。這一系列四十年間在亞洲發生的重大事件影響著中心學者的研究、討論。

我們其實代表了對中國及西方之看法的不同聲音。我們中間有人反對越戰，有的同情紅衛兵，也有的反對共產主義，還有人權活動家。對中國及中國人民的濃厚興趣則是大家的共同之處。我們對中國的瞭解令我們不能接受外國對中國的極端的眼光，當中國與西方彼此敵對時，我們仍將中國人當成人類社會一員看待；當中國開始對外開放，一些天真熱心的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180度大轉變，我們並沒有忘記中國仍有許

多問題，重重困難。天安門事件後，一些人打算孤立中國，而我們仍保持與中國接觸。中心一直以來主要由美國不同的私人基金會支持，有70%的學者來自美國，但資助者明智地將中心向世界各國學者開放，越來越多的學者來自其他地區，使中心免於成為美國觀念的一統天下。

我們也來自各個不同的學科，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還有法律，甚至一些人文學科。在各自的學院裏，我們須用理論去解釋研究的發現，而在中心，理論及學科並未妨礙我們去探究複雜紛繁的中國現況。也有學者從國際關係的層面觀察中國，但那時研究的重心則是中國內部的發展變化。學者最為重要的認知來自我們對尋常百姓生活的瞭解，對居民委員會、工作單位、生產隊、公社、學校的班級、工廠等等基層組織的審視。與大陸移民的接觸，讓我們比那些未曾到香港來的研究者，對中國有了更為生動具體的認識。

香港歷來是瞭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我們這些學者熱忱地關心著中國發生的變化，並在這裏有機會接觸對中國有興趣的記者、政府官員和商人。

## 中心的創建

設立大學服務中心的構想最初起於白魯恂(Lucian Pye)教授與Bill Marvel之間的一次談話。前者那時在麻省理工大學任教，後者為教育與世界事務基金的主席，基金旨在強化美國高等教育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美國原本有著不少教授中國歷史、語言文學的教授，但五十年代麥卡錫得逞，令各大學及基金會對開展當代中國研究小心翼翼，卻步不前。待麥卡錫失寵，教中國學科的教授趁機啟動新的研究項目。基金會也紛紛合作，他們意識到對中國這個泱泱大國無知，對誰也沒有好處，要瞭解中國，必須資助獨立於政府駕馭的學術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及美國學者聯合會委員會成立了不同學科的學術委員會，商討為促進對當代中國的瞭解必須要做的事。卡耐基、米蘭、福特基金會都打算提供援助。Bill Marvel曾擔心支持當時最強的兩個中國研究中心之一，華盛頓大學或哈佛大學，都有可能造成分化。兩個中心的兩位主要人物，華大的George Taylor和哈佛的費正清在二戰期間共事時就不咬弦。中國研究者稱George Taylor作「西大王」，他比較同情國民黨，反對共產黨；而費正清這位「東大王」對國民黨在二戰中暴露的弱點感受至深，對中國人民將會支持共產黨抱開放態度。

Lucian Pye建議Marvel不如就將中心設在美國學界論戰的中立地帶香港。Franz Schurman在香港住了一年後，1959年寫了簡單的建議書，倡議在香港設中心。這裏可以令學者從來往大陸與香港的移民中，也從中國傳出的書面資料及傳言中瞭解中國大陸，還可以吸引學者從世界各

地前來。經過幾年學者諮詢，並得到卡耐基基金資助的承諾，1963年秋，Marvel派了一位部下Bob Gray到香港來創建中心。那時香港政府頗緊張建立這種機構會惹惱中國，威脅到香港這塊仰仗中國的鼻息才得以存在的殖民地。Marvel擔心破壞精巧的政治平衡，Gray亦處處小心。他到香港數月仍未能令中心成立，被召回國。Marvel於是打電話給那時在香港放假的加州大學法學院學者Jerome Cohen。很快，Cohen開始中心的運作，地點設在半島酒店附屬的馬可波羅苑(Mareo Polo Court)。幾個月後，我們找到亞皆老街155號這座殘舊的小花園洋房。四分之一世紀中，這裏成了我們可愛的家。

中心學者有自己辦公室，可在此查閱資料，訪問到過中國的人，彼此交換見解。多年來中心的餐廳熱鬧非常，大家聚在此討論問題，聽演講。那時香港友聯研究所收藏有最豐富的中國研究資料，友聯由所謂既反共產主義又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創辦，初期主要做出版發行，也藏有豐富的中、英文資料。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友聯研究所厚厚的剪報卷宗，為做專題研究的學者提供了極大方便。友聯的主任Anderson Shih同意中心按期付費，讓學者可以借閱友聯的卷宗和圖書。1966年以後友聯漸漸衰落，不再訂閱報刊資料，中心別無選擇，只好自己開始收集書刊。

回首當初，我們這些進入不了中國的學者，曾多麼無知，天真而興奮地洗耳恭聽新近從中國出來的遊客、難民，還有當時可去中國的一些外國政府官員。中心成立時，我們連最簡單的中國組織架構圖都見不到，僅僅開始對政治運動是怎麼一回事，對公社的架構，工分、居民委員會，單位有所領悟。

我們當中有些人，由Franz Schurman開頭，像我們那些研究克林姆林宮的弟兄一般，磨練揣摸大陸報刊字裏行間之意的本領。我們學會去識辨可能發生運動的徵兆，按各種線索去揣測其嚴重性，運動開始後又去捉摸其形式。官方新聞的好處是一旦某事見了報，便不必去懷疑其政策含義。我們學習小心辨認對某些人的批判，不僅瞭解什麼人牽扯在內，也要看到制度本身的傾向。我們還不能進入中國，便對大陸新聞措辭用句的細微差別培養出相當的敏感性。香港報刊對大陸官方新聞後面的含義有各種謠言與傳聞，要衡量其可靠性可不容易，只能儘量去分辨真假。中心成立之初，我們大多數人都渴望直接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來客，但那時可沒有誰會來。儘管我們一廂情願，想與中國溝通，想建立能客觀研究中國的學術領域，但卻被視為敵人，當成是稍加掩飾的間諜中心。許多年之後，才有些香港的統戰人士小心翼翼地開始接受邀請到訪中心。

對大陸移民訪談也頗為敏感，許多難民害怕到中心來會被看成是支持此方或彼方勢力。一些香港政府官員要求我們避免可能引起反共之嫌

的舉止。對願意前來的移民，有時也很難分清到底他們所說的是真實情況，還是想當然，或者謠言。僅訪問一個人難免會被誤導，但對許多人訪談，詢問具體的細節，我們則可以知道他們在當地的日常生活。當然，對北京的高層政治鬥爭，他們所知也不比我們多。就在中心成立前的一年，1962年，大批移民獲准越過邊境湧進香港，之後移民和遊客陸續陸續來到。總的說來，透過對他們的訪問，我們對大陸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大致不偏的看法。

想當初，我們這些在中心做研究的學者大都只二、三十歲，創建中心的Jerry Cohen也不過33歲，我們這些研究生或年輕教員在學校受制於各自的教授，在中心卻不受權威左右，一班學者無上下之分。不時到中心來的資深學者如Lucian Pye和 Dock Barnett是眾人出色的師長，但他們的影響力來自其學識、見解而非地位。

## 里程碑

中國於1971年對外開放，某些西方人覺得毛出賣了革命事業，但對大多數那時在中心的學者，中國的開放標誌著新時代的來臨。中央政府開始接見學者訪問團，告訴他們中國的發展近況；訪問團回來再向大家傳達。亞洲研究學者委員會的第一次美國年青學者訪問團中，便有好幾位中心學者。團員回到香港舉行報告會，記得第二次亞委會學者從中國訪問回來的報告會是在1972年。對我們這些渴望去中國的學子，在70年代等待機會的過程何等漫長。我們焦急地盼望能被納入訪華團隊，一有機會便申請以遊客身份前往。

閱讀過大陸報刊，也訪問過移民，我們覺得胸有成竹，進入中國後仍有新發現。我看過除四害運動的成就，但一到中國，人家就給我一頂蚊帳晚上用，我猜想並非所有害蟲都已消滅了吧。

中心早年的主任兩三年一換，早期的主任，兩位年輕學者Bornie Frolic和 Martin Whyte只做了一年。John Dolfin上任後，中心各方面漸次走向自立。他從1974年到1988年在任。John做博士生時研究西藏，做中心主任之前已在香港住了好幾年。他的中文非常好，對如何在香港辦事精明在行，不論你做哪方面的研究，他都能提供有用的建議，告訴你應該與誰聯絡，如何去研究，他也耐心地告訴新來的學者去哪裏租房子，吃好吃的東西。John經營中心時經費拮据，許多年甚至不知道下一年經費的著落。他總是設法少花錢而買到好的圖書資料。友聯研究所不再收集資料後，中心仍不斷擴大收藏，John的成功之舉其中之一是沒有花費太多，便收集到完整的一套中國地方報紙。美國基金會一般注重開展新的項目，而非對之長期資助。就像福特基金所稱，他們的角色是播種、澆灌幼苗，而樹木須自己生長下去。大

學服務中心這時已是棵大樹，不可能再得到捐助或每年的經費去維護這棵大樹。再說中國已經開放，大家都去找基金會支持他們前往中國或邀請中國人訪美。香港已不再是中國唯一的大櫥窗。到1980年代，米倫(Melon)，卡耐基、魯斯、福特等基金會相繼撤走對中心的支持。中心是否能支撐下去，還是將其圖書資料分給各個大學？我們董事會必須認真考慮中心何去何從。

香港幾所大學都有興趣接管中心，問題是他們能否繼續支持中心相當規模的資料收集，能否令中心保持對世界各地學者開放？香港中文大學的秘書長，當時也是大學的第二號人物陳方正來找我和另一位董事會的成員Lucian Pye。我們討論了中大是否能持續支持中心的圖書收藏，並對各國學者開放，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八十年代後期，陳方正，關信基、金耀基、翁松燃，還有幾位在中心做過研究的中大教授一道在校內遊說，並接觸港府。大家意識到國際學術界的支持，對九七回歸後確保香港可以繼續進行對中國大陸的客觀研究，十分重要。港督衛奕信和政府中的一些人亦深信如此。於是成立了中心的國際顧問委員會。

1988年中心關上亞皆老街155號的大門，將圖書搬到美麗的中大校園圖書館側。中心在校內仍然獨立運作。中心的主任關信基確保中心新的發展方向，熊景明則是一位出色又盡職的行政人員和圖書館員，她在原來中心的學者中建立起特殊的友誼圈，並利用現代技術手段使中心的收藏能為更廣大學者服務，成就非凡。所有試圖建立當代中國資料收藏的人都知道，要建成完善的研究圖書資料，不是單單按常規選購圖書，而是要建立不同的管道，搜羅各種非商業出版的書刊。景明在資料收集、整理、新技術應用等方面均貢獻傑出。她和關信基令世界各地來的中國觀察家賓至如歸。

到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學者也開始來使用中心的資料，中國內地有圖書館的某種收藏會超過中心，但沒有一所圖書館如此管理完善，方便使用，資料如此齊全。不少學者發現許多課題在中心做研究要比在本地圖書館方便得多。香港本地也有越來越多學者與中國建立聯繫，他們也更需要使用中心資料。

熊景明和中心的同仁努力使中心對中國研究資料收藏保持領先地位，並且盡量使其方便讀者利用。

## 總 結

1963年，我們誰都不清楚中心今後的四十年將何去何從。如果我們有遠見卓識，恐怕會這樣想：我們希望在中心做研究的這批學者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有深刻的認識，中國研究學術領域得以發揚光大；我們希望中國能對外開放，而我們的研究能夠有助於中國進入國際大家

庭。我們希望有朝一日能與中國大陸學者攜手合作，加深彼此的瞭解。我們希望心懷喜悅走過這段路。四十年後，時過景遷，大約花了幾百萬，無數的努力，就像大陸官員所說：完成了我們的歷史使命。讓我們祝賀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祝賀所有過去、現在、未來有幸參與這一使命的人。

(熊景明 譯)

# 導言

本書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四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的中譯本。中心原名大學服務中心，1963年由西方學者在香港設立，為西方當代中國研究的主要基地。六、七十年代，以「紅色中國」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學家及社會科學學者，在價值中立的基本態度後面，或者帶著一廂情願的憧憬，或者抱著對專政獨裁的批判意識，隔岸觀火，探究鐵幕後的中國。設在香港的「大學服務中心」像河中央的小島，聚集了一代又一代國際中國研究者，因冷戰而沉寂的中國研究在這裏熱鬧起來。西方各國學者獨立於政治的學術研究，為促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了解、為跨越地界的中國研究學術圈的形成，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中心於1988年遷到香港中文大學，十八年來中心的變化，反映了也推動了中國研究的大趨勢，即逐漸突破內地與海外的疆域之分，擺脫意識形態的約束，學術規範國際化，中外學者的合作從相互利用走向優勢互補。一段段有趣的歷史，三位中國研究泰斗，哈佛大學的傅高義 (Ezra Vogel) 教授，麻省理工大學的白魯恂 (Lucian Pye) 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教授，在文中有生動的記敘。

目前，中心擁有當代中國研究最完善的圖書資料，組織經常性的學術活動，包括每週的午餐研討會，每年的中國研究國際研究生研討班，以及暑假為兩岸三地年輕學者舉辦的中國研究方法研習營，成了十分活躍的中外學者交流平台。

雖然本書作者均為各個研究領域的佼佼者，陣容鼎盛，他們對21世紀初中國現狀的描述，也難以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全貌，遑論追上大陸急劇變化的步伐。令這些優秀的學術論文不會過時，值得年輕學者參考的，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和治學態度，此乃翻譯出版此書之初衷。

## 提出的問題

每位作者均提出了令自己深感興趣、想要究其原本的問題。

Richard Baum：在中國活力四溢的經濟與相對僵化的政治之矛盾



中，以及在日益積累的社會壓力下，政府治理方法改革的路徑何在？

Jae-Ho Chung：隨著改革深化，如何解釋中央與地方之間複雜而多變的關係？經濟領域的分權和有選擇的集權，與非經濟領域的控制之「中國特色」如何體現？走向又如何？

Pierre Landry：當城市在經濟架構中的角色凸顯，獨立性日增時，原有的「組織人事」制度仍然有效嗎？幹部任期與腐敗、業績與個人政治前景之間關係如何？

Nicolas Becquelin：對新疆人這樣有明確自我認同的族群，西部大開發戰略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新的發展戰略，例如定居移民的增加，與原有的社會、經濟是否會產生矛盾？

Gunter Schubert：台灣的國家認同和政治認同走過了一條什麼樣的路？目前的台灣政治與台灣的民族認同之間有什麼關係？

吳玉山：台灣的民主化、本土化和兩岸交流組成一曲什麼樣的三重奏？台灣不同陣營的領導人如何使用這一籌碼？美、中、台的戰略三角又怎樣在其間產生作用？

陳健民、丘海雄：中產階級企業家的崛起，對中國民主發展作用如何？企業家有什麼樣的自我評價和期許？他們對腐敗和社會改革持何種態度？他們的政治取向和實際參與情況又如何？

Christine Wong：告別了盲目追求GDP增長的時代，中國的財政政策如何調整？財政收入分配的規則作何改變？龐大的公務員工資支出、地區間財政收入的不平衡、責任分配與政府間財政體系的矛盾如何處理？

Carsten Holz：1978年的經濟結構改變，對統計工作提出了什麼樣的挑戰？國家統計系統採取了哪些新的概念和變量？數據採集、編製與評價系統作了哪些調整？政治因素如何導致基層數字的虛假？

Jean Oi：中國由政府主導的企業改制如何操作？在改制過程中地方政府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如何權衡？

Deborah Davis：宿舍讓位給私房後，私人財產的觀念和傳統的親屬關係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微妙變化？普通百姓如何看待和適應因產權制度、私有制而引起的道德衝突？

Børge Bakken：中國官方公佈的犯罪數字，以嚇人的速度增長。統計方式、犯罪構成、警察的獎罰機制、嚴打動動等等與實際的治安狀況之間謎一樣的關係有線索可尋嗎？經濟不平等、腐敗等等與犯罪，甚至有組織犯罪的關係如何？

Jerome Cohen：四十年來，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有些什麼進步？目前發展的瓶頸何在？從刑偵階段到司法階段，有哪些制度上的缺陷亟待改革？